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文
心
雕
龍
全
譯

(修訂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梁〕劉勰 著 龍必錕 譯注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文心雕龙全译

(修订版)

[梁]刘勰 著 龙必银 译注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心雕龙全译/龙必锬译注.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9

(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

ISBN 978-7-221-08208-4

I. 文… II. 龙… III. ①文学理论-中国-南朝时代②文心雕龙-译文③文心雕龙-注释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3442 号

书 名	文心雕龙全译
著 者	[梁]刘勰
译 注	龙必锬
责任编辑	孟筑敏
装帧设计	余强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字 数	496 千字
印 张	33.5
印 数	1-3000 册
定 价	49.80 元

再版说明

出版的境界是：为饥作浆，为旱作润，为冥作光，为往圣继绝学。《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担当这一历史的重托，挟着春风走到了学人和国学爱好者的面前。

书似青山常乱叠，眼光如炬淘金来。《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推出，即以权威、精到、普及的面貌风靡整个书界。本套丛书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规划重点项目。但多年断档，令人怀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名著全译，多以三五本的规模推出，而今天的《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出手尽显大家气度，一次集中推出五十种，满足眼睛与心灵的饕餮。

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浩如烟海的历代名著，就是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字不仅记录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历史与人文，物质与精神，成为后来人的精神家园，而且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但古人留下的典籍，由于时代的变异，语言的古奥，当下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且以往坊间的不少古籍今译的读物，大都难尽人意：

——选译本。如《国语选译》《诗经选译》等。了解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人知道，“选”是一种评论的方式。鲁迅先生曾指出，如果对陶渊明只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不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这类“金刚怒目”式的作品，那就很难使读者对陶渊明的“全人”有完整的认识，若“再加抑扬”，就“更离真实”了。所以说选译本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白话本。如《白话史记》《白话搜神记》之类。这类今译本有的置原文于不顾，随意增删敷衍，从严格意义上已不是原书；有的译文尚称严谨，但无原文对照核查，欲引用古人文句还要另觅原书，难称

人意。

——单译本。这类书最多，译文之外附有原文、注释，其中也不乏质量较高者。遗憾的是见木不见林，缺乏学术系统性，读者买到一本算一本，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了解很难达到全面。

本丛书在策划之初就考虑到避免以上各种译本之不足，本着推陈出新、汇聚英华、弘扬传统、振兴华夏之宗旨，化艰深为浅显，融译注为一炉，俾使社会各界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之完整原貌，有利于当下人文精神建设，又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译介，乃延聘海内学界通人，精选史有定评之夏商迄晚清经史子集四部，以全注全译形式重新装帧、重新校勘整理出版。所选各书前言对该名著之时代、作者、内容、成就、文献版本皆有详赡说明，各篇各卷前有简明扼要的题解，原文选用业经整理的善本，注释采用学术界公认的成果，译文强调忠实原文、通达流畅。

书行天下，道亦随之，既有品味，又有普及，为大家营造出一片文化底蕴深厚、知识境界广博、思想空间深邃的精神沃土，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的孜孜追求。此次修订是在前辈学人呕心沥血的基础上，重新进行认真的审读和勘校，是在“国学热”基础上的一次新的提升，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亦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今日重现书界，必将旋起一种新的阅读风暴。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形成当代的人文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现代化人文化的进程中开启今人智慧、滋养今人心灵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经典不腐更不朽，它是源远流长的活水，天光云影，亘古永在。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8年9月

序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崇高地位,在国外也有一定影响。从它问世之日起,一直为学术界重视:如历代的品评,群书的采摭,前人的引证、考订,各家的音注、校释,都非其它诗文评论著作所能比拟,就是最好的说明。解放以来,先后出版了研究著作三十多部,发表的论文七百多篇,探讨的问题不断深入,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而且已超越了国界,成为世界各国不少学者共同关注的一门学问。

“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是对齐代以前文学理论批评的一次大型总结,同时也是对齐代以前文学创作实践经验的一次系统探讨。进一步研究它,发掘它,为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确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了更好地批判继承这一珍贵的古代文论遗产,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借鉴,我们不但需要高质量的研究论著,也需要有高质量的普及读物。

龙必铤同志久有志于《文心雕龙》的普及工作。早在 50 年代后期,当他就读于四川大学中文系时,就酷嗜《文心雕龙》,研读勤奋,曾发表论文《〈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三三九期)。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然夙好所在,三余之日,仍时时诵习,展披不倦。粉碎“四人帮”后,万象更新,龙必铤同志也得以实现夙愿,在繁忙紧张的新闻工作岗位上,耗费了十余年的业余时间,前后四易其稿,终于完成了《文心雕龙》全书的今译,可谓锲而不舍,有志竟成。

我很高兴地读了《文心雕龙全译》,感到在近年来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本书是比较适合青年读者需要的一种。注意吸收了“龙学”界的研

究成果而有己见,译文力求忠实于原著,注释详略适宜,行文明白流畅,都是本书的优点。相信它对于阅读原著有困难的青年读者,将会发挥良师益友的作用。

杨明照
一九九一年二月



前 言

“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

——鲁迅^①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巨著，也是世界文论的巨著。只要你读了这部著作，便会被它那宏富的内容，严密的逻辑，精到的见解，诗样的语言所征服，不能不赞叹差不多一千五百年前刘勰所建树的丰碑，从而激起民族自豪感。鲁迅先生把它和西方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世界古代文论名著《诗学》相提并列，是有充分依据的。他对《文心雕龙》的评价，确实是刘勰的知音之言。

—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它的理论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固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剖情析采，笼圈条贯，摘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这是在介绍全书的结构安排。在这一结构安排里，我们可以窥见该书的文学理论体系。

“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论，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这是刘勰文学理论的基础。“本乎道”，是《原道》的基本精神，讲文学本原于自然之道。其着眼点在探讨道（自然之道）——圣（作家）——文（文学作品）的关系。刘勰首先从自然之道和文的关

^① 鲁迅：《诗论题记》。见《鲁迅研究年刊》创刊号。

系讲起,认为天地万物都有文彩,合乎自然规律。这就是说,文彩本身显现自然规律,自然规律要通过文彩来显现;自然之道寓于文,文体现自然之道。有了人,道和文的二元关系,便发展为三元关系,刘勰于是进一步探讨了道——圣——文的关系。讲“人文”是《原道》的最终目的。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有心思者,当然也有文。人文的出现也合乎自然之道,人文的写作也应符合自然之道。什么人才能根据自然之道来写作呢?刘勰认为只有圣人才能担当此任,所以他说“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从而解决了“道——圣——文”三者的关系。《原道》中的圣人具体指的是儒家圣人,刘勰认为,儒家之道最符合自然之道,因而他把儒家经典说成是人文的代表。

“师乎圣”,是《征圣》的目的。在“道——圣——文”的关系中,“圣”是中介。“圣”实际是最杰出的作家。因为这些作家修养最好,智慧最高,对文的功用认识最全面深刻,最能遵自然之道以为文。这几点也可以说是刘勰对作家的要求。刘勰在“文之枢纽”中列《征圣》一篇,说明他懂得创作主体的重要,重视创作主体的研究,并非为了“装点门面”。

“体乎经”,《宗经》的目的就是要以经书为文章写作或文学创作学习的榜样。如果说《征圣》重在论作家,《宗经》则重在论文体。从刘勰讲的“道——圣——文”的关系来看,“经”是最好的文学作品,因其符合自然之道,既明道,又有文彩,自然成了“人文”的典范。这虽有些夸大,但他也确实看到了经书写作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酌乎伟”。《原道》《征圣》《宗经》三篇,基本上阐明了“道——圣——文”的关系,为全书奠定了理论基础。但从文学的实际看,只讲明“道——圣——文”的关系,还不能说明所有的文学现象,解决所有写作中的实际问题。特别是《征圣》和《宗经》把圣人和经书都说成是作家和作品的最高典范,这和后来的文学发展便有了矛盾。其中最突出、也是争论最大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配经的纬书,一是如何看待“奇文郁起”的楚辞。这两个问题,用儒家圣人之经来衡量,一伪一奇,很有代表性,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很重要,故刘勰于“文之枢纽”中写了《正纬》和《辨骚》,分别论之。“经”既是人文的最高典范,纬又是前代用来配经的,所以紧接《宗经》便写了《正纬》。然而刘勰“正纬”的目的不在捍卫经之纯洁性,而在于作文,所以他在对纬书

进行具体分析后,指出其“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有助文章”。这就是他主张为文要“酌乎纬”的原因。

“变乎骚”。文学发展中,《离骚》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和激烈争论是必然的。《离骚》本身是继承传统而又有所创新的产物,如果囿于经典,势必不承认其不合乎经典的方面而贬低《离骚》。然而从文原于自然之道的原理看,从文学发展的规律看,从《离骚》作品的实际看,他突破了宗经的局限而充分肯定了《离骚》的变和创新。这实际是对其“征圣”、“宗经”原则的突破、修正和补充。既“征圣”、“宗经”而又讲“通变”,他的理论也就更完善了。

综上所述,可见“文之枢纽”五篇为一整体,相辅相成,不可缺一。《原道》则是“枢纽”之“枢纽”。“枢纽”五篇的精神,都贯穿全书。

“论文叙笔”。指从《明诗》至《书记》二十篇,为文体论。其中从《明诗》至《哀吊》为“论文”,即有韵之文部分;《史传》至《书记》为“叙笔”,即无韵之文部分;《杂文》《谐隐》两篇则界于文、笔之间。文体论部分的篇数占全书的40%,字数约占全书的45%。重视文体的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之一,《文心雕龙》也不例外。刘勰研究文体论的原则是:一、“原始以表末”。即研究每一种文体都要考查其历史发展,用历史的观点来看待每一种文体,所以这一部分实是分类文体史。二、“释名以章义”。即对各类文体名称的含义予以解释。刘勰对文体名称的解释多数是比较合适的,不少解释还很有见地。三、“选文以定篇”。即选出各时期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予以评论,这部分在各篇中的比重都很大,评论了大量的作品,兼评了大量作家。四、“敷理以举统”。即对某文体写作原则的概括。这些概括因为是在研究分析大量作品的基础上进行的,大多比较切合实际,有一定的理论高度和深度。这一部分总结性的东西,在各篇中篇幅虽不多,但却是精华所在。从上述可知,刘勰的文体论实际是融史、作家、作品、评论于一体,目的在于总结各种文体的写作规律,进而探索文学的普遍规律。

“剖情析采”。这部分为创作论,是在文体论研究总结各类文体的写作规律基础上的综合,即对文学创作一般规律的探索。“搞神性”,指《神思》和《体性》的研讨;“图风势”,指《风骨》和《定势》的研讨;“苞会通,阅声字”,指《通变》和从《情采》到《总术》所有篇目内容的研讨。《文心雕龙》的创作论部分,内容是很丰富精采的,择要简介于下:



《神思》是创作论的纲。探讨想象与艺术构思的问题,它揭示了文学艺术构思具有形象思维的特点。它提出了文学创作关键是要处理好“物——神(情)——言”的关系。“物”与“神”的关系是“神与物游”,人的想象离不开外物的形象,人脑里没有外物形象的储存便无法想象。“神”与“言”,文学艺术的想象离不开语言,文学形象的表现也离不开语言文字。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是围绕如何保持“神思”的通达、如何用语言去艺术地进行表达的问题展开讨论的。《体性》讨论作家个性和风格的关系,作家个性中先天禀赋和后天学习的关系。《风骨》讨论“风”与“骨”的关系,“风骨”和“采”的关系。《定势》讨论文章“情——体——势”的关系,“势”与风格的关系,“势”和“采”的关系。《通变》探讨文学的继承和革新的关系。《情采》探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熔裁》探讨文章主题思想的熔炼和文辞的裁剪的关系。《附会》讲附辞会义、谋篇布局问题,和《熔裁》相呼应。另外《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诸篇都主要从文章修辞技巧、艺术手法等方面就如何表现文章的思想内容进行了探讨。刘勰以这样多的篇幅来探讨这些问题,体现了他情采并重的观点。这一方面说明,由于“文学的自觉”,这些问题都提上了议事日程;另一方面也说明,刘勰能以“通变”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发展,敢于肯定文学新的发展趋势。《总术》是创作论的序言,也可说是总结。

“崇替于时序”。《时序》讲文学的发展变化,是一篇先秦至南朝宋齐的文学简史。其贡献,一在第一次勾出了我国古代文学史;二在发现了文学发展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这样一条文学发展的规律。这一条和专论文学和自然景物关系的《物色》以及其他篇章的有关论点,反映了刘勰的一个文学基本观点:文学与自然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文学反映自然和社会现实,又反转来影响自然和社会现实。“褒贬于才略”。《才略》评论历代作家,是作家论的专篇。它论作家按时代顺序,所以也可算《时序》的姊妹篇。两篇合起来读,可以更好地了解古代文学的发展史。“怵怅于知音”。《知音》是文学批评论和文学鉴赏论的专篇。探讨了文学批评和鉴赏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正确进行文学批评和鉴赏的原则和方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人评文都基本贯彻了他自己提出的原则和方法,所以许多评论都比较中肯,合符实际。“耿介于程器”。《程器》是作家

论,主要讲作家的德才修养,要求作家德才兼备。“长怀序志,以驭群篇”。《序志》是全书总序,是刘勰交给读者了解全书的钥匙,自然也是帮助我们探讨《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钥匙。

通过上述简介,我们从《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中可以发现他和我们今天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内容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如它大体上可以分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批评鉴赏论。它所论及的问题也几乎包括了今天的文艺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更可贵的是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刘勰的许多意见在今天看来仍然是正确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

《文心雕龙》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它的方法论分不开。刘勰在《序志》中宣布他研究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是:“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其精神是:结论不管与前人是同是异,都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判断;他的基本方法是“唯务折衷”,力求公正。通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

一、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是《文心雕龙》研究论述问题的一大特点。刘勰很重视占有材料,他的结论大多是从大量事实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原道》讲文学的本原,讲“自然之道”。这看来很是玄奥、抽象的题目,但它的论述并不是讲得玄之又玄,而是从天地、日月、云霞、花木、虎豹、林籁、泉石的有文彩,归结出万物皆有文彩是一种“自然之道”,从而得出“无识之物,郁然有采,有心之器,其无文欤”的结论,说明文学作品要有内容,也要有文彩,要讲究内容和形式都美是自然而然的。《宗经》的主张是刘勰尊儒的必然结果,所讲的各种文体和“五经”的关系也有事实根据,并非是单纯推导得出的结论。“五经”是刘勰看到的用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文章和文学作品,探源文学作品必然要联系到它们。比如《诗经》和后代的诗歌,《春秋》和后代的史传,都确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所以他说,“赋、颂、歌、赞,《诗》立其本”,“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也并非无根据的论断。《辨骚》对屈原作品的分析,堪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范例。它分析了它们“同于风雅”的方面,又分析了它们“异乎经典”的方面,从而得出屈原作品是“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的论断,对屈原的作品给予了

很高的评价,连鲁迅先生也称赞刘勰是屈原作品的“知言者也”^①。

在“论文叙笔”中,“原始以表末”、“选文以定篇”,就是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历代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进行评论。“敷理以举统”正是在对大量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理论概括。因为这些概括是从实际出发的,是以大量的材料为根据的,因而一般都比较符合实际,意见也比较中肯。“剖情析采”即创作论部分是在“论文叙笔”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所探讨的问题及对问题的回答都是从文学创作实际中来的。《神思》讲的想象和艺术构思问题,便是文学创作中遇到的最普遍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刘勰根据前人和个人创作经验,对一系列有关问题提出了基本上合符实际的看法。《体性》把作品的各种风格归纳为八种基本类型,并认为作家的个性和其作品的风格一致,“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这也是对大量作家及其作品分析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二、运用辩证观点来研究和探讨问题是《文心雕龙》的又一大特点。这里分述如下:

第一,注意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研究问题。文学领域像各个领域一样充满了矛盾,刘勰不仅看到了这些矛盾,而且抱着极大的兴趣去考查、研究这些矛盾,努力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他的具体办法就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一分为二”就是看到矛盾双方的对立,尽量揭露矛盾。论人、论作品则既论其优点和所长,也论其缺点和所短;对文学史上、文学批评上或文艺理论上有所争论的问题,也把不同的意见揭示出来,进行分析。“合二而一”就是在“一分为二”的前提下,看到矛盾双方的同一性,而提出一种处理矛盾双方的关系或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刘勰所谓的“唯务折衷”。“折衷”,也就是“取中”,求取矛盾的同一性,得出一个正确的、合符对立统一原则的看法。这个所取之“中”,已经不是简单地在矛盾双方各取一点的混合物,而是既同于矛盾双方、又不同于矛盾双方的一种新的意见。刘勰运用这种方法解决文学领域内的问题的例子可说比比皆是。如《体性》讨论风格问题,先提出了写作中作者思想感情及其表达的“隐”与“显”、“内”与“外”的矛盾;作者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正”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表现便是作家风格千差万别的矛盾。然而这些矛盾既是对立,也是统一的,即“各师成心,其异如面”。作家的风格和其个性是一致的,在进一步探讨形成作家个性的因素时,他又看到了才、气、学、习这四个因素的关系是先天“才、气”和后天的“学、习”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在作家个性的形成上,既要承认先天的禀赋作用,又要承认后天的学习作用。刘勰在作家风格问题上的成就之所以远远超出前人,不能不归功于他辩证的思想方法。可以这么说,整个《文心雕龙》都贯穿了“对立统一”的观点,贯穿了“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方法,许多精辟的见解都是在“一分为二”、“合二而一”的基础上“折衷”、“取中”得来的。

刘勰对矛盾的转化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他观察到文思的“通”与“塞”,主题的“一”与“乱”,文辞表达的“密”与“疏”、“巧”与“拙”,知识的“贫”与“博”,这些矛盾的双方无不在相互转化之中。对这种矛盾双方的互相转化,他认为可以加以利用,其基本原则有二:一是促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一是防止向不利的方面转化。防止向不利方面转化又要防止过头或不及,这仍是其“折衷”的一种形式。如对质文关系,要求“文质彬彬”,即既要防止走只要“辞达而已”的回头路,又要防止其转化为“淫丽”。对夸张,要做到“夸而不诬,饰而有节”,既要防止取消夸张,又要防止“夸过其理,名实两乖”。促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这是在矛盾已经向不利方面转化时的一种办法,所谓不利也就是偏离了“中”,所以就表现为纠偏,即纠正过头或不及。刘勰还看到不论防止矛盾向不利方面或者促使矛盾向有利方面转化,都要有一定条件,所以他的许多防偏或纠偏的意见都具有建设性。如文学批评中“文情难鉴”是一个矛盾,它是文学批评中出现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怎样使“文情难鉴”转化为“文情可知”?他提出的办法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这就从一个方面为矛盾的转化、为正确开展文学批评创造了条件。

第二,注意研究矛盾的发展变化。矛盾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形成矛盾的发展运动,文学领域内的矛盾也处于不断的运动发展之中。刘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所以他注意考察文学领域里矛盾的发展,从考察文学领域里的矛盾来考察文学史,又从历史的发展里来考察文学领域里的矛盾。他事事强调“原始要终”、讲“通变”,就是



这一观点的体现。对“道”与“文”、“圣”与“道”、“圣”与“文”、“情”与“采”、“质(朴)”与“文(丽)”、“体”与“性”、“通”与“变”等等的关系,《文心雕龙》都作了历史的考察。这样的历史考察当然也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文学矛盾运动的认识。因为从历史发展来观察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和从矛盾对立统一的运动来观察历史,就可以更好地避免偶然性和片面性,更好地揭示文学运动的规律。通过矛盾对立统一运动的考察,刘勰还发现,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由于矛盾双方的此消彼长,总是要出现一些偏离“中”的倾向。如对“情采”,有时过分强调“情”,有时又过分强调“采”;对“文质”,有时过分强调“文”,有时又过分强调“质”;对“通变”,有时过分强调“通”,有时又过分强调“变”。文学运动中出现这种过头和不及的现象,也成了一种必然的、规律性的东西。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的“折衷”意见,当然也就更能揭示内部规律。比如对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讹而新”的形式主义文风,他通过历史的考察,看到它的出现是必然的。有了这种深一层的认识,对此就不会惊惶失措,而能从发展规律上寻找其致讹的原因,顺其规律去纠正偏向,使之合“中”。这样的对策当然也就棋高一着了。

第三,注意把各种矛盾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研究。各种矛盾都是互相联系的,刘勰注意到了这种联系,很注意从总体上来把握各种矛盾,考察各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考察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时又注意考察其与整体的联系。《文心雕龙》全书有很鲜明的整体感,有完整严密的结构,和它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

首先,它把文学放在宇宙时空里来考察,探讨它和宇宙时空的关系。这在今天看来有些奇怪,其实也不奇怪,这是刘勰在探求文学本原时穷究的极限,也是他认为的整体的极限。天和地是一对矛盾,天地自然和人又是一对矛盾,古人猜测到了天与地,天地自然与人的同一性,刘勰在此基础上看到了“天与天文”、“地与地文”、“人与人文”的对立统一,猜测到了“天文”、“地文”、“人文”的同一性。把“自然美”与“艺术美”、把自然文彩和文学等同起来,抹杀了它们之间质的区别自然是错误的,但归根结底,它们之间是有同一性的。刘勰能够看到这点,能够在他那个时代找到这一理论武器,为其整个文学理论体系奠下基石,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种矛盾的整体观念。

其次,刘勰把文学放在客观现实(包括自然和社会)中来考察,把

文学作为客观现实这个整体的一部分,看到了它和客观现实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文学反映客观现实,又反过来影响客观现实。这其中,刘勰还特别把文学放在整个社会现实中予以考察,把它作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考察了社会多方面因素与文学的对立和统一关系,看到了社会各种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学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得出了许多正确的结论。

再次,刘勰把文学领域内部的各种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从整体的角度来考察各种具体矛盾,又根据各种具体的矛盾来考察整体,以探求“为文之用心”,即文学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文体论、创作论、作家论、文学史论、批评论,都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又自成一个整体而各有其研究对象,它们之间既有区别而又相互渗透。拿创作论来说,围绕文学创作所要解决的“物——情——言”关系探讨了创作中的各类矛盾及其关系。《神思》以下各篇所讨论的具体矛盾都处在矛盾的序列之中,有其内在联系。对这些具体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索,既是对文学创作具体规律的探索,也是从一个侧面对创作基本规律的探索。创作各项具体规律的综合及其内在关系的揭示,即是对创作基本规律的揭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刘勰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理论财富,他的研究方法也是一笔极可宝贵的财富。

三

《文心雕龙》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从东汉末年至南朝的三四百年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极其动荡的时期。社会的动乱,一方面给民族、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另一方面也冲破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自觉。这一时期在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又一个高峰,除有名的建安文学外,还出现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学家。但在文学自觉的运动中,或者由于片面强调追求文学的形式美,或者由于满足士族地主阶级空虚的精神状态的需要,出现了一股形式主义的文风。文学应向什么方向发展?文学创作应遵循什么原则?这些问题都需要总结历史经验来予以理论上的回答。这种理论上的探讨,既是文学自觉的需要,也是文学自觉的表现。于是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也出现了一个高峰。这方面首开其端的是三国魏的曹氏兄弟,曹丕的《典论·论文》不论在这一时期或整个文论史



上都有其重要地位。继之而起的是西晋的陆氏兄弟,陆机的《文赋》可算文学自觉的宣言。此后各种论文体、作家和创作的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现。这些都为《文心雕龙》这部文学理论巨著的集大成打下了基础。

然而,如无刘勰,岂有《文心》?刘勰,字彦和,大约出生于南朝宋明帝泰始二、三年(公元466—467年)^①。他祖籍东莞郡莒县(今山东莒县),西晋末永嘉之乱时祖先南渡,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的祖先属庶族地主^②。曹魏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至南朝发展为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士族地主垄断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大权,庶族地主在统治阶级内部受到歧视和排斥。因为刘勰出身庶族地主家庭,加上父亲早死,家道自是衰败贫困,所受歧视当为更甚。但是,刘勰是个有抱负的爱国之士,青年时便立志“纬军国”、“任栋梁”,想对时代有所贡献,改变社会现状,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主张丈夫学文要“达于政事”,强调“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崇敬爱国诗人屈原,称赞爱国志士刘琨,这都是他爱国和经世济民抱负的表现。所以尽管他“早孤”、“家贫”,仍然“笃志好学”。大约20岁时,他到当时江南有名的定林寺“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僧佑本姓俞,是当时的名僧,大学问家。对刘勰上定林寺,鲁迅先生称之为“吃教”^③,为的是给人仕找“敲门砖”或“上天梯”。因为这样一来可以好好读书,准备充任国家的“栋梁”;二来可以取得在佛教界的地位,当时佛教已成为国教,要想入仕当官而不懂佛教、在佛教界没有地位是不行的。果然,条件成熟后,他便离开佛门,登上仕途了。

刘勰的入仕和《文心雕龙》的关系很密切。他约在三十多岁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大约经过五六年的苦心经营,约在齐和帝中兴元、二年(公元501—502年)间写成。这部巨著可说是他入仕的“自荐书”、“敲门砖”和“上天梯”。他想取悦于当时政治地位很高的文坛领袖沈约,因地位低下,无从自达,便装成卖书人的样子,守在路边,等沈约的官车过时将书呈上。沈约看后,大加赞赏,称它“深得文理”,置于案头,随时观览。大约由于沈约的推荐,不久刘勰便于梁武帝天监初

① 刘勰生年,史无明文,此系推算。

② 参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

③ 鲁迅:《淮风月谈·吃教》。